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目 录

-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
运动概略……………李群杰（1）
- 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吴 坤（10）
- 党领导下的昆华师范学校抗日救亡活动……………曹世文（23）
- 抗日战争前期（1938—1942）昆明职业青年运动
简述……………李天柱（52）
- 镇南师范和楚雄大姚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万国祥（63）
- 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回忆……………潘大逵（80）
-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民盟的活动……………杨维骏（99）
- 抗战后期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李艺群（122）

回忆昆明抗日救亡运动的片断·····	蒋阜南(147)
抗战末期“民青”的建立、发展及其革命活动 ·····	洪德铭··(154)
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回忆·····	王光闾··(183)
“一二·一”运动前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革命 斗争·····	赵家康 和万宝 彭允中(192)
	林毓杉 王越峰 杨 固
我在滇军工作的点滴回忆·····	刘慕向(216)
中国日记(1945——1946)——一位英国作家笔 下的“一二·一”运动及其它 ·····	罗伯特·白英著 刘守兰翻译 刘 钦审校(229)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 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概略

李群杰

一、奉命回滇

1937年5月，长江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派我回滇工作。当时蒲特同志交代说：“云南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彻底破坏，以后就没有党组织了……”，“你是云南人，在云南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回到云南后，第一，要利用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凭借个人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掩护革命活动。第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在运动中吸收先进，建立党的组织，扎下根子，以领导革命……”。我于同年5月下旬回到昆明（按：1935年我曾受中山大学学生会委托，回昆明进行联系学运工作，又于1936年在昆明中等学校任教，认识和结交了不少进步师生），通过以往关系，接触更多青年学生，在开展救亡运动中，先后吸收了唐登岷、罗自昌、匡沛兴、曹世文、王心良、施祖植（即施子健）、杨润珍、段惠仙等十多人入党，接着尹冰、刘英明、陈践明以及李家鼎（即李同生）等同志回到云南，于1937年7月

成立中共昆明支部（李家鼎同志的组织关系，是我在云南替他解决的，随后吸收到支部工作），支部委员有：我（书记兼组织），唐登岷（宣传），尹冰、李家鼎、曹世文为秘书。并在省重点中学昆华中学和昆华女中、昆华师范等校建立党组织，分别由唐登岷、曹世文、杨润珍、谭惠英等同志负责。

二、开展工作

在工作中我们了解到，在大革命失败后，云南还有一些同志继续战斗，并建立了一定组织，因彼此互不了解，开始时曾产生一些猜疑和误解，但是由于目标一致（双方都致力于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两个组织在工作上很自然地形成互相协力配合的局面，集中表现在下述工作上：一是对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学抗会”的领导工作，是由两个组织的伍兴仁、唐登岷等同志出面共同担负的；二是民教馆的歌咏班，是由两个组织的李家鼎、赵国徽等同志共同领导的。后来歌咏活动深入到“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及各专、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歌咏活动，还将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组成“读书会”（介绍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以后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具备条件的个别同志又吸收入党。（按：1939年初，歌咏团由李家鼎、张锐、董藩组成党小组，由李家鼎同志负责）。

昆明支部为了扩大党的影响，还创办了《前哨》杂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派送罗自昌、匡沛兴、王心良等同志及不少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

三、成立滇工委

为了弄清和解决云南两个组织并存问题，1938年春，昆明支部趁尹冰同志要返回汉口转延安之便，由他向长江局反映情况，并请示解决办法，另一组织（临工委）也于同年3月先后派李浩然、李立贤（陈方）同志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的联系。当时长江局未掌握临工委情况，乃由罗炳辉同志转介到延安解决。

1938年4月，长江局派巡视员马子卿（于莘）到昆了解情况，就地解决问题。

李立贤又从延安返回武汉，见到了长江局组织部长黄文杰同志，了解到长江局已派马子卿来滇，指示李立贤同志迅速回云南，还传达了王明的指示：对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之间的矛盾，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集中力量在城市搞抗日救亡运动。李克农同志还讲了到龙云部队里去工作的问题。5月初，李立贤带着黄文杰同志的介绍信到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同志，廖公又把越南郑东海的关系交给李带回，转给云南地方党组织。

马子卿同志大约在1938年4月下旬到达昆明，先后找到两个组织的领导同志（即李群杰和费炳）传达了长江局给他来滇解决两个组织问题的任务。同时又分别接触了两个组织的成员李剑秋、李家鼎、唐登岷等同志，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又同李、费两同志深入研究，最后决定两个组织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委员共五人：李群杰（书记并管统战），费炳（负责军运），李立贤（管组织），唐登岷（宣传），吴宗遥（工运）。

此外，把《南方》作为工委公开刊物，由李剑秋同志总编（原《前哨》杂志被国民党查封）。

至此，云南重建党组织以后的两个组织并存局面获得解决，增强了团结和力量。

工委成立后，决定今后主要工作任务是：

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各级组织，需扩大党的力量。还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势力的矛盾，做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马子卿同志还补充说：“上次从长江局来，博古同志指示的对国民党中央同云南地方实力的矛盾，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是不对的”。

在这次传达中，也讲了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的决定，和中央关于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决定。

这次马子卿同志同意李群杰同志做上层统战、情报工作，不担任省工委书记的要求，保留其省工委委员的职务，改由马子卿同志单线联系。此后，工委书记由马子卿同志担任，并派何礼同志为工委委员负责青委工作。

四、云南省工委成立以后的工作

1、加强了党的建设

对老党员严格进行审查，并为了发展党的力量，壮大党的队伍，从“民先”成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总数约80余人。根据马子卿同志的提议，3月间又在昆明南坝一家农民的院坝里办了一期党员骨干训练班，参加的学员有刘璧华、丁健华、徐植（徐干）樊子诚、曹世文、包平章、尹宗发、禄时英、周赞

淑（陆英）窦家静、李寿贞、张浴兰、范立华、杜浩然、邓永寿、董藩等20余人（刘碧华等为学员支部委员）。这次训练班虽然取得较好成效，而且这批学员在今后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但是，拉开了横的关系，特别是省工委委员和马子卿同志都暴露在学员中了（按：唐登岷负责筹办训练班，马子卿在训练班中主讲党的建设，李群杰主讲马列主义，李立贤主讲统一战线政策，费炳主讲游击战术，刘惠之主讲中国革命史），后来受到南方局的批评。董必武同志指出：把公开的救亡运动的作风用在秘密工作上，违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原则。

省工委成立以后的两年，党员人数由数十人增加到1941年的二百八十余人（包括外地转来的）。党在外县的工作，也有所发展。截至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除了罗平、沾益较早建立的党的支部外，又在昭通、师宗、泸西、陆良、弥勒、开远、个旧、文山、楚雄、大姚、姚安、保山、普洱、磨黑等县建立了工作据点，有的成立了党的支部，有的派有党员潜伏活动。

2、党的外围组织和青年学生工作有新的进展

学生工作一直是省工委的工作重点之一，自从1938年春，党领导的学生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省党部取消以后，公开的学生青年救亡运动受到了挫折和限制。省工委把工作移到不公开的青年抗日先锋（抗先）队上，通过这个外围组织，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发挥宣传和组织作用，曾在昆华师范、昆华女中、昆华工校、富春中学、民众歌咏团等组织了分队。

1938年5月7日以纪念国耻纪念日，举行昆明市学生游行，高呼反对压制民众运动和妥协投降，争取全民抗战……。

1938年，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先后迁到澄江、大理等地）。在联大的学生中有一批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他们的关系转到地方，把“民先”和“抗先”进行合并统一，命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力易舟担任队长，袁永熙负责组织，唐登岷负责宣传，李家鼎负责秘书，并在联大和各中学建立分队。在开智印刷厂，茨坝机械厂建立了民先小组。

同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逃到河内，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汪在昆明对龙云曾施加影响，为了孤立，打击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活动，争取稳定龙云，省工委策动舆论和动员各校学生反对投降卖国。

同年年底，因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各中等学校奉命疏散到呈贡、晋宁、路南等县，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和工作发展的需要，成立了民先晋宁队部，负责领导三县的民先工作，队长为张振铭，组织盛泽沅，训练李天柱，秘书曹世文，接着在呈贡官渡乡召开了地方队部队选会议，新的队委会由以下人员组成：队长徐树人（徐干），秘书李天柱，训练曹世文，参加队委的还有郭琪（云大）王昌原（昆女中）

民先成员发展到近千人，同国民党三青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1939年，马子卿从南方局带回撤消民先的决定（因暴露在敌人面前，不宜于继续活动）把一部份队员吸收入党，而青年工作则改变方式继续进行。省工委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青年工作，当时南方局进一步指示：工作的总方针是利用龙云与蒋力石之间的矛盾，发展我党的力量，并提示工作重点放

在学生和产业工人上。为了贯彻这项指示，特别加强对青运的工作，先后参与青运领导工作的同志有何礼、郭佩珊、胡昌治等同志，郭、胡离昆后，又由杨天华、袁永熙、劳家顺、李三楠、王成玉和邹斯颐等同志领导。西南联大有总支，昆华师范、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在澄江）云南大学均有支部，（发展到三十多人）云大附中支部（路南）截止1940年底，青委系统的党员发展到百余人，其中最多的是西南联大，党员有六十多人。

3、工人运动逐步发展起来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前，云南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开初只在昆明市的五金工厂、火柴厂、缝纫业和个旧锡矿有少量的党员进行工作，1938年，随着沿海工厂相继迁来昆明，我们就从昆明、罗平调配力量，加强了职工方面的工作，1938年成立职工工作委员会，由吴宗遥任书记，刘浩负责组织（后由吴世林接替）叶莉芬负责宣传，截至1941年春，党在云南纺织厂，昆明火柴厂、裕滇纱厂，振昆织染厂，昆明五金厂、开智印刷公司、官印局、大中印刷厂、滇越铁路、一平浪盐矿、昆明炼钢厂、昆湖电厂、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五十三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昆明广播电台、西南运输处、昆明巫家坝飞机修理厂、瑞丽飞机场、大道生织布厂、昆明制革厂以及昆明市缝纫工人中，都开展了工作，有的建立了党的支部（如云南纺织厂、支书为江玉芝，火柴厂支书为刘革非，制革厂支书为朱启毅）有的在一片工厂地区建立了支部（如昆明西郊一片，支书先后为尹宗发、李福仁、王纲正）有的建立党的小组或“民先”小组（如大道生织布厂等）党员在工人中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扩

大联络面。并在工人中办起合作社、识字班、歌咏队、读书会、壁报，还有宣讲会等，把工人拉进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39年5月1日，通过火柴厂发起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到会的有一千多人，西郊汽车工厂的党组织，领导了中央电工器材厂反对总厂总务长、中统特务刘某阻挠和破坏工人群众自谋福利的斗争，要求厂方改变每天两餐稀饭（粥）一餐干粮，反对虐待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并且赢得整个矿区和工厂都保证工人每天吃两干一稀，使工人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空袭，有的工厂党组织还在工人中组织了秘密的防奸护厂小组，同暗藏的好细、特务进行斗争。

截至1941年春，工人中的党员增加到六十多人，党在工人中的力量增强了。

4、推进了妇女工作

1939年省工委加强妇女方面的工作。成立了妇女支部，支书先后为郑速燕、李家珍，妇女支部主要负责职业妇女方面的工作，主要对象为中小学教师，职员、店员及其它青年，还有部份上层妇女工作。

5、文化工作方面的进展

1938年下半年，在工委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云南分会（理事长为楚图南）、云南记者协会，广泛地团结了云南新闻、话剧、花灯等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

1940年春又通过个旧工商界进步人士苏莘农，在个旧创办曙光日报，由苏本人出资，我党派了一批党员担任经理总编、编辑等工作，并成立党支部，由赵国徽同志任支书。

6、上层统战工作

1937年——1938年，中央就先后托请周素园、黄齐生（王若飞的岳丈）两位先生到昆明向龙云沟通情况，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原昆明支部和临工委都在上层统战方面作了工作。1941年中央又派朱家璧、张子斋等同志在滇军中工作，在第二路军中传播了党的影响，以后孙起孟同志、华岗同志、周新民同志等又分别对龙云做了许多统战工作。

与省工委李立贤单线保持联系的郑东海，也在省工委帮助下逐步发展了黄文欢、黎松山、高鸿岑等同志入党。又帮助他们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昆支部，共同配合进行反法西斯等的秘密工作。

1940年胡志明从昆明到广西，省工委协助安全护送过境（按：周恩来同志指示省工委对越南同志一要互通情况，二要帮助解决对方提出的要求，三要不干涉人家的事情）。

7、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

“皖南事变”后，云南乌云滚滚，白色恐怖加剧，省工委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对急性和暴露，省工委将大批党员疏散到外县或省外，工委有些同志到重庆，马子卿同志也调离云南，由涂国林接替，没有几天涂又调走，另派郑伯克同志接替。以后南方局又增派侯方岳、刘清等同志来昆，成立新的一届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由郑伯克同志任书记。从此云南的工作逐步得到发展，

“一二·一”运动闻名全国，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武装斗争（滇桂黔边区纵队）成效显著，统战工作开花结果，最后促成卢汉的云南起义，昆明免遭破坏。

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吴 坤

在抗日战争前期，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云南早期地下党建立于1926年底，省委遭到了完全的破坏。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为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被破坏的云南地下党组织亟需恢复和重建，以便领导全省人民投入新的战斗。

1935年秋，在上海特科工作的李浩然由上海被派到云南，与费炳接上关系，并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任书记。1937年初李浩然离滇后，省临委由费炳、李剑秋、陈方组成（费任书记）。

1937年5月，中共长江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派李群杰回云南工作。南工委指示：要利用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以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掩护革命活动；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 and 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吸收先进分子，建立党的组织，扎下根子，领导革命。李群杰回到昆明后，先后吸收了唐登岷、曹世文、罗自昌、匡沛兴、施子健等一批党员，加上尹冰、李家

鼎、陈践明、刘英明等组成昆明支部，由李群杰任书记，唐登岷、曹世文、尹冰、李家鼎等亦参加支部领导。于是云南出现了两个组织并存的情况，却都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发动、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5月，长江局派马子卿来云南了解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中心任务是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把两个组织合为统一的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李群杰任书记，委员有费炳、陈方、唐登岷、吴宗遥等。合并时有党员六十多人。1939年春，李群杰专搞统战工作，省工委书记由马子卿担任，以后又增补了何礼、刘碧华、赵国徽、李剑秋等为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先派涂国林来云南，由于特务盯梢，工作展不开，很快便调回南方局，后来派郑伯克、侯方岳、刘清等来云南组织新的省工委，直到全云南解放。

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敌后援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通过陈方、赵国徽、李剑秋等同志，由进步学生唐登岷、伍兴仁、曹世文、谭惠英、江毓琛等组成秘密的“云南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昆明支部通过李群杰、唐登岷在省学联的基础上组织了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抗敌后援会。如“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系由昆华师范学校发起，各校积极响应，于

1937年7月中旬，由各校选派代表参加会议后正式成立的。“学抗会”的宣言系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群杰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对日宣战的精神草拟的。宣言明确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当时成立群众团体必须向国民党省党部备案，“学抗会”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去备了案，属国民党省部官办的“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领导。鉴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开始形成，凡有利于抗战的行动，我党都支持，积极配合，同时对其不利于坚持团结抗战的言行，则进行有节制的抵制和斗争。地下学联的领导人大都当选为“学抗会”的领导成员。如总干事是云大的陈德培（党的团结对象），副总干事伍兴仁（共产党员，云大附中学生），宣传部长唐登岷（共产党员）、研究部长罗自昌（共产党员）、组织部长余维芳以及负责妇女工作的谭惠英等（均系原学联领导成员）。当时昆明的八所大中学校都成立了分会。分会的主要领导人均系共产党员或进步学生。另外还组织了“云南妇女抗敌后援会”、“云南青年职工抗敌后援会”等，开展了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活动，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学抗会”除了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提高学生的觉悟，推动抗日救亡会运动外，还到社会上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总会与分会都组织了一些宣传队。最初在市区街头宣传，讲解国际形势、抗战形势，宣传要民主，要发动全民抗战，全力支援前线等等；后来（假期间）就到农村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人民群众知道了日寇的侵略暴行，懂得了只有全民抗战才能最后胜利的道理，纷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为了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六周年，1937年9月18

日，党通过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中小学生约三万多人参加。此外其它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国民党军官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次游行在市民中扩大了影响，把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学抗总会”还与各县的学校联系，并寄出宣传提纲供各县学生宣传使用。此外还编排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街头戏。如《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当兵去》、《仁丹胡子》等，还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发动学生参加赵国徽、李家鼎等领导创办的“民众歌咏团”。“学抗会”在学生中传播了党的声音，相当一批人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还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如罗自昌、王心良、匡沛兴、罗树藩以及黄世铭、赵树民、甘泽等，党通过抗敌后援会这一组织形式，使抗日救亡的歌声传遍了昆明的各个角落，传到了边远的山村。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目，1938年春，抗敌后援会便被国民党省党部强行解散了。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激流，深得民心，反动派是阻挡不了的。地下党又通过其它渠道和其它形式，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新的高潮。

（二）“抗先”、“民先”的活动

中共昆明支部鉴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急需加强组织领导，以求巩固发展。于1937年底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将运动中涌现的骨干进一步组织起来，并指定李家鼎、唐登岷分别担任“抗先”总队正副队长。从此抗日救亡工作就以“抗先”为中心，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抗先”总队下设分队，各大中学校设分部，由各校党员或进步学生负责。各校的进步学生及民众歌咏团的成员，大都秘密吸收为“抗先”队员（抗先队员开始有五十人左右）。队员不定期秘密集会，由党员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介绍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情况。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搬迁昆明，学生中有党员、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员。6月，省工委研究认为，“抗先”与“民先”性质完全一样，经协商决定把二者合并为“民先”，并交给西南联大的党员力易舟、袁永熙、徐直等负责，统一执行党的任务。“民先”、“抗先”合并后，于1938年9月在官渡区召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的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徐树仁为总队长，郭琪负责总队常务，曹世文、王昌厚负责宣传，李天柱为秘书。“民先”成立后还利用假期由曹世文主持在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期训练班，由各分队的骨干参加，主要由徐树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根据党中央决定，“民先”组织宣布解散。“民先”中的优秀分子都被吸收入党，如许南波、祁山等，有的就失去了联系。但其中绝大部份，后来都成为云南民主运动的骨干。各分队“民先”的优秀分子入党后，便参加了各自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有的学校、工厂则新建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各单位秘密的或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便由各党支部直接领导。

（三）培训党员

云南地下党的两个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省工委会，对党组织

作了清理整顿，并于1938年底1939年初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1939年3月，省工委以疏散农村躲避日机轰炸为名，在昆明郊区南坝一户农民家里，举办一期党员训练班，抽调各地部份党员集中学习。参加学习的党员有二十多人。由省工委负责人马子卿讲“党的建设”，李群杰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陈方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惠之讲中国革命史，费炳讲党的抗日游击战并介绍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学习结束后，便分赴各个战斗岗位。这次培训的党员后来大都成为各条战线、各个工作岗位的骨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学校中的党组织和秘密读书会

抗日救亡运动在昆华师范、云大附中、昆华女中最为活跃。特别是“昆师”，穷学生较多，党的组织也建立得较早。从1938年8月第二届省工委成立后，直到1949年12月云南解放，昆师的党组织就未中断过。“昆师”党组织先后的负责人有赵国徽、唐登岷、曹世文、包平章、许南波、祁山、张人文等。云大附中的党组织是1939年建立的，最初的党员有耿根、王以中、朱述武等，后又发展了范家乐、陈遵浩、张家驹等入党。昆华女中亦是1939年建立的党组织，党员有禄时英、陆英、范立华、李寿珍、张洛兰、窦家静、李玉华、杜浩然等。

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是地下党团结进步青年、培养骨干力量，发展组织的重要活动方式。当时昆师、云大附中、昆华女中以及有党员的学校如西南联大、云大、富春中学、云瑞中学等都建立了秘密读书会。组织学生学习《社会发